

〔韩国〕
闵宽东

著

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



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

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

〔韩国〕 闵宽东 著

学林出版社



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

作 者——〔韩国〕闵宽东

责任编辑——徐智明

封面设计——王晓阳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三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文庙路 120 号)

电话: 63768461 传真: 63768540

印 刷——上海港东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5

字 数——35 万

插 页——4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616-549-5/I·200

定 价——24.00 元



闵宽东

1960年生,韩国天安人。韩国庆熙大学中文系毕业,台湾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现任韩国庆熙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论文《中国古典小说流传韩国之研究》、《〈三国演义〉在韩国的流传与再创作》、《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的翻译、出版、研究现况》、《中国古典小说流传韩国的时期、过程及版本研究》、《话本小说咬蔗研究》、《〈三国演义〉在韩国的流传与版本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的受容研究》等,并译有《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等多篇重要论文。

序

鲁德才

中国与韩国都是有悠久历史与文化的国家。朝鲜半岛与中国陆路相邻,水路相通,为文化交流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两国使臣、从事中韩贸易的商人、留学生、僧人是文化交流的使者。早在 284 年(韩国百济时代),中国古代小说《山海经》即传入韩国,此后,文言小说如《搜神记》、《世说新语》、《太平广记》等,白话通俗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包公演义》、《红楼梦》,乃至性爱小说等等各种类型的小说相继输入,可以说蔚为大观。而在这林林总总的各类小说之中,必有稀见本或孤本。中国明代著名的收藏家、画家陈继儒在《太平清话》中说:“朝鲜人爱书,凡使臣入贡限五十人,或旧典新书、稗官小说,在彼所缺,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便问,不惜重金购回,故彼国反有异书藏本。”所谓“异书”当指存世的稀见本或是孤本。

据我所知,明刊本《包龙图判百家公案》在全球只存两种本子:一为日本名古屋蓬左文库藏万历二十二年刊本;另一本就是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藏万历二十五年万卷楼刊本。这两个本子对于研究包公案小说形态的发展有极大价值。也是奎章阁藏的《型世言》,更是海内孤本,1992 年在法国科学研究中心陈庆浩教授指导下,由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影印出版,1993 年韩国朴在渊教授重新校注出版,中国大陆多家出版社又据二

家本重印推出。至于《啖蔗》、《九云记》小说,尽管学界还有许多争议,尚不能确切判明创作年代与身分,但至少为学人提供了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新的视点。韩国小说界的朋友告诉我,民间私家藏书或寺庙内可能还存有稀见的“异书”未被发掘。如据本书作者考证,《三国志通俗演义》于1569年以前就已传入;《金瓶梅》传入的时间也不会晚于1618年,其他较有影响者亦当如是。因此,我相信,日后还将有新的发现。

中国周边国家乃至欧美国家传入中国古代小说,包括用汉文重新改写的汉文小说,是一笔可观的文化财富,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关注。法国陈庆浩教授、台湾王国良教授等,搜集、整理、出版了越南、韩国所藏的汉文小说。毫无疑问,各国保存的中国古代小说,或是用汉文过录改写的古小说,实际上已成为世界性的文化财富,任何有关这方面的文献资料的整理介绍与分析,都有助于推动各国学者的研究。各国学者也根据本国所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整理、剖析工作,韩国学者的研究似较系统完整,参与的学者与研究的层面也较多较广泛。

闵宽东教授的《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就是一部很有代表性的专著。

令我赞赏的,在第二章版本考略中,作者广泛搜罗国公立图书馆、高等学校图书馆以及私家藏书,不仅罗列了宋以前小说到清代在韩国所藏的书目,而且对一千一百四十四部小说的著者、年代、版式、出版书馆、纸质、现所藏地等都作了详尽的考订。且不说作者要耗费大量时间走访查找各方存书,单就记述分析每一部书的过程,就足见作者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也正因此,读者可据本书提供的各项信息,有选择地进行研究。事实上有几种版本很值得推究。就白话小说版本而言,书中列有《金瓶梅》六本不同年代刊出的皋鹤草堂本,难得的是其中有清康熙乙亥

(1695)刻本。在《新刻金瓶梅词话》没有被发现之前,皋鹤草堂本广泛流传于社会,而此本又以有无回目评而分为两个版本系统,这两种系统的本子按作者的提示均可检索到,对于研究《金瓶梅》版本系统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照。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保存有年代较早的用汉文或韩文抄写的中国小说的过录本,这是一块不可忽视的研究园地。如《型世言》有明木刻本,又有韩文写本,韩写本写年不详,大约在明刻本之后,它是据现存明刻本过录,抑或别有所据?如果韩国学者将两本对照,仔细考详,肯定会提出许多新鲜问题。同样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包括鲜为人知的《水浒志语录》、《水浒传总论》)、《西游记语录》、《今古奇观》、《列国志》、《西汉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岳武穆精忠传》、《大明英烈传》、《开天辟地全传》、《薛仁贵》、《后水浒传》,清本如《红楼梦》、《好逑传》等等,都有韩写本,无疑可开辟古代小说比较研究的新领域,当然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

应当指出,《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不只罗列了韩国所藏中国古代小说的书目,而且对几部稀见小说如《剪灯新话句解》、《啖蔗》、《型世言》、《红楼梦》版本的可靠性与否作了细微辨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各本的价值也作了较精到分析。第五章关于中国小说的读者与评论,第六章传入与影响之探讨,虽然讨论的是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的流布情况,撷拾了丰富的文献资料,然而作者却从传播与接受美学的角度,论证了古代小说在韩国古代各阶层的反映与影响。令我惊诧的是,在韩国认同的、诋毁的,甚至是禁毁的,同中国古代有极相似的认识和价值判断。这也使我想到韩译本和汉文改写的小说,为何历史演义类多于其他类小说,为何性爱小说的输入相对地要少于其他国家。显然这同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同一个国家的

主流思想的制约有关系。

我期待着中韩两国学者把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顶点。

(本文作者为南开大学教授)

序 二

李时人

韩国不仅保存了相当多的中国古代典籍,也有大量古代高丽时期、李氏朝鲜时期所编写的汉文书籍文献,其中不乏中国古代小说方面的资料。本世纪早些时候,学者注意到15世纪李朝时刊印的学习汉语用书《朴通事谚解》中记载了在中国早已佚失的《西游记平话》的故事梗概,还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一段“车迟国斗圣”文字。这对人们认识中国16世纪出现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是一部“历史累积型”的作品,对人们研究《西游记》的成书过程提供了很大的帮助。80年代末,旅法华人学者陈庆浩等人在汉城大学图书馆(奎章阁)藏书中发现了明刊陆人龙《崢嶸馆评定通俗演义型世言》四十四篇。《型世言》原帙在中国已经长期失传,《幻影》、《三刻拍案惊奇》等书中所保存的篇目仅三十篇,由于这一发现,才使我们了解这部晚明出色的短篇小说集的原貌^①。最近,又有学者在18世纪李朝英祖时期刊行的中国小说选本《增补文苑楂橘》中发现了已经佚失的明代文言小说《韦十一娘传》的原文^②。

其实,中国本国以外所保存的各种古代“汉籍”——既包括中国流传于域外的典籍,也应包括其他国家、民族之人以汉文所编写的各类书籍——绝不仅仅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包括古代文学、古代小说是有意义的。由于地缘、人文、历史等原因,包括

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东亚地区,以及按现代地理划分属于东南亚的越南等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不仅大量输入汉文典籍,而且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都曾经以汉字作为书写工具,并以汉文创作了大量的哲学、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著作。这些典籍文献首先是这些地区和国家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同时也是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对于我们认识东亚地区历史文化及其发展也有极其重大之意义。

韩国之所以保存有大量古代的“汉籍”,无疑基于朝鲜半岛与中国悠久绵长的文化渊源关系。在朝鲜半岛,从摆脱了中国郡县统治后所建立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及以后所建立的新罗、高丽、李氏朝鲜等历代王朝,无论在典章制度、民俗风习,还是在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方面,无不受到中国文化持久和深刻的影响。

首先是汉字在朝鲜半岛的长期使用。朝鲜半岛最早使用的文字就是汉字,古代高丽时期的史书《三国史记》谓百济近肖古王三十年(375)得中国东晋人高兴为博士,始有文字,但根据史书所载公元4世纪前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可知汉字在朝鲜半岛的使用实际上要早得多。只不过自百济近肖古王设博士,以及较之稍早的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置“太学”(《东史纲目》第二),以教授中国的儒家经典,汉字的使用被朝鲜半岛本土人所建立的高句丽、百济王朝法定而已。存世的414年高句丽长寿王所立《好太王碑》,记述高句丽建国传说和称颂永乐太王(好太王)开疆扩土之功绩,全文1775字,用纯熟的汉文写成,书法在隶楷之间,方严凝重,匀称工致,是当时高句丽人掌握汉文水平之明证。《魏书·百济传》所载北魏孝文帝延兴二年(472)百济王余庆所上表文,写得也十分典雅。其间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汉字是朝鲜半岛唯一通行的文字,举凡文教科考、修史

释经以及文学创作无不以汉字为工具。朝鲜李朝世宗二十八年(1446),鉴于汉文艰深,不便平民学习,令成三问、郑麟趾等人创造“谚文”,并设“正音厅”,编印书籍,加以推广,始有本民族之文字。但以后很长时间内,汉字仍然被一般文人士大夫视为“正统”文字,大部头的史地书《高丽史》、《东国輿地胜览》以及诗文、小说等仍多用汉文写作。直至1894年甲午海战后,李朝废除科举,成立各种新式学校,汉字使用才逐渐衰微。以后有留美学生俞吉浚等人以谚文和汉字混合使用,撰写西游见闻,创立各种近代报纸杂志,提倡语文一致,政府也宣布公文应以韩、汉文混合体书写,汉文才不复独立通行。至于完全废除汉字,则更是十分晚近的事。

汉字通行朝鲜半岛长达一千余年,与半岛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包括学校、教育、科考等方面仿效中国是一致的。史载,朝鲜半岛三国鼎立时期,高句丽在372年设立“太学”,使贵族弟子“诵经习射”;百济在374年设经学博士(《东国通鉴》卷四);地处半岛东南隅的新罗,也于真德女王五年(651)置学官“大舍”,传授中国经典(《三国史记》卷三十八)。新罗统一半岛以后,神文王二年(682)立“国学”,元圣王四年(788)设“读书出身科”,以《春秋左氏传》、《礼记》、《文选》、《论语》、《孝经》、《曲礼》等为科举考试内容(《三国史记》卷十)。王氏高丽王朝时期,力兴文治,创学校,增学制,复设科举。其学校教育以中国儒家经典为主,取士也仿唐制分制述(进士)、明经两科,前者试诗赋策,后者试经。李氏朝鲜号称儒教王朝,科举制度完善,教育也很发达。朝廷的太学继高丽朝仍称“成均馆”,下高五部学堂,后改为四部学堂,称“四学”,设教授、助教,全国之府、牧、郡、县则设乡校,分置教授、训导。除官学外,各地还有各种私学,教授平民,而这一系列教育,未离开中国的“四书五经”等典籍。

由于官方提倡和实际应用的需要,在漫长的历史时间内,中国的古代典籍在朝鲜半岛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北史》已经记载高句丽“书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卷九四)。《旧唐书》记高丽“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记百济“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卷一九九)。综合各方面的历史资料,可知在十几个世纪的漫长时间内,中国的经、史、子、集以及其他方面的书籍大量和源源不断地传入了朝鲜半岛。

中国典籍传入的途径很多。一是朝鲜半岛历代王朝以国家的名义向中国求书和买书,如新罗神武王六年(686)“遣使入唐,奏请札记并文章”,武则天令所司赐之(《三国史记》卷八)。高丽忠肃王时遣博士到中国,元廷赠宋秘阁藏书 4300 余册,其使又购得 10800 卷图书带回(《增补文献备考》卷二四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清,明陈继儒《太平清话》云:

“朝鲜人爱书,凡使臣入贡限五十人,或旧典新书、稗官小说,在彼所缺,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便问,不惜重金购回,故彼国反有异书藏本。”

二是大量的留学人员带回各种书籍。唐太宗时允许外国人入太学学习,于是当时有大量的新罗人、日本人负笈留学。唐朝又首开“宾贡”之门,允许外国士子参加科考。有唐一代,高丽人在唐及第者有金云卿、金可纪、崔致远等六十人,其后登五代各朝科第留名者有三十余人,参榜于宋、元、明者也有数十人。这些留学生回国以后,有的受到朝廷的重用,有的则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坚。大量的归国留学生不断带回中国的旧典和新书,如高

丽忠烈王十五年(1289),安珣自元大都携归新刊的朱熹《四书集注》,不久,白颐正又在大都修“程朱之学”回国(《高丽史》卷一〇六《白文节传》),使中国的“理学”很快在朝鲜半岛得到传播。至于通过商业买卖使书籍流入朝鲜半岛,数量也很巨大。《旧唐书·白居易传》已记载:“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一金换一篇。”宋元以来木版印刷在中国日趋普及,书籍越来越商品化,商业流通更成为重要的途径,大量的中国通俗小说就可能主要是以这种途径进入朝鲜半岛的。

古代朝鲜半岛不仅从中国输入大批典籍,自己也不断刊印汉文书籍,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如李朝世宗时,大举编印汉籍,凡经学、史学、文学乃至天文、兵法、医药、农事方面的书籍无不刊印,又编纂各种丛书、类书。成宗时也是有书必印,刻印了中国和韩国的大量文史之书,甚至中国的杜甫、苏轼、王安石等个人文集也全部翻印。为了配合汉籍的传播,又有大量的“谚解”风行。

韩民族是个善于学习他人的民族,也是极富创造力的民族。汉字的使用和中国典籍的输入,大大促进了朝鲜半岛的文化发展,使之在没有本民族文字之前,就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以汉字为表述工具,朝鲜半岛逐渐形成了发达的经学、佛学、史学以及文学艺术等。

古代朝鲜半岛的汉语文学可谓十分兴盛。传说中国西汉末年时的高句丽琉璃王已经能吟四言两韵的《黄鸟歌》(《三国史记》卷十三)。也有人认为,中国陈时高句丽僧定法师之《咏孤石》一诗实为朝鲜诗歌之祖。其诗云:

迴石直生空,平湖四望通。岩根恒洒浪,树杪镇摇风。
偃流还渍影,侵霞更上红。独拔群峰外,孤秀白云中。

读起来与中国的六朝诗歌风韵十分相似。新罗王朝与唐王朝关系密切,许多人到中国留学和参加科考,不仅参与创作的人多了,文学水平也有提高。如崔致远留唐 18 年,咸通十五年(874)进士及第,曾任宣州溧水尉,高骈开府淮南,任其为都统巡官,因写讨伐黄巢的檄文轰动文坛,后充国信使东归,仕至翰林学士、兵部尚书。其著作《桂苑笔耕》二十卷流传中国,另在本国刊文集三十卷,五七言今体诗一卷,四六集一卷。致远归国时,唐人顾云赠诗云:“十二乘船渡海来,文章惊动中华国。十八横行战词苑,一箭射破金门策。”(《三国史记》卷四六《崔致远传》)新罗之后的高丽王朝四百余年间,文坛更是名家辈出,李奎报、李仁老、李齐贤等均以诗文著名,金覲、朴仁亮使宋时所作诗文,曾由宋人编为《小华集》刊行。中国明代洪武时所建立的李朝,享国五百余年,其时汉文诗文基本与中国并行发展。前期形成“义理派”与“词章派”,后期则崇尚“唐宋八大家”,诗歌也有“宗唐”和“宗宋”之别。在长期浸淫于汉文学的过程中,还形成了不少文学世家,如金尚宪和其孙寿增、寿恒以及其曾孙昌协、昌翁都是诗文名家。清初中国文坛领袖王士禛就曾在集中称引过金尚宪的诗(《池北偶谈》卷一五)。直至李朝末年,为阻止日本阴谋吞并朝鲜,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前赋诗言志:

“丈夫处世兮,蓄志当奇。时造英雄兮,英雄造时。北风其冷兮,我血则热。慷慨一去兮,必屠鼠贼。凡我同胞兮,毋忘功业。万岁万岁兮,大韩独立。”

所作仍为汉文诗。

无论是在古代中国,还是在古代朝鲜,诗文都被视为文学正

宗,这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观有关。但是,小说是叙事文学的最高形式,小说的产生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文学发展之必然。产生于7世纪末而在8世纪达到相当繁荣的中国唐人“传奇”,是世界上最早符合近代小说美学要求的短篇小说。以后在中国,不仅文言短篇小说创作绵延不断,又陆续出现了白话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繁盛。如果说中国古代小说是中国古代叙事艺术达到一定高度的产物,那么,随着历史文化与文学的演进,小说越来越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镇。由于古代朝鲜半岛与中国这种密切的交流关系,中国古代小说之广泛传播朝鲜半岛也成了顺理成章之事。

唐莫休符《桂林风土记》曾载:“新罗、日本相前后,遣使人贡,多求文成张鹞之文集归本国。”而张文成恰恰是最早的唐代小说作家之一,其小说《游仙窟》虽然后来在中国失传,但因其生前已经传入韩国和日本而得到完整的保存^③。《朝鲜王朝实录》还有燕山君令使者到中国购买《剪灯新话》、《剪灯馀话》、《效顰集》、《西厢记》等小说戏曲的记载(《燕山》卷六二)。虽然古代朝鲜像中国一样,也视小说为“稗官野史”,但无法抗拒小说的吸引力。《朴通事谚解》中有一段有趣的对话,说明了当时人们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兴趣:

“我两个部前买文书去来。”“买什么文书去?”“买《宋太祖飞龙传》、《唐三藏西游记》去。”“买时买《四书》,既读孔圣之书,必达周公之礼,要怎么那一等平话?”“《西游记》热闹,闲时节好看。”

正因为如此,所以虽然古代朝鲜一般士大夫多以“荒诞不经”来看待小说(《朝鲜王朝实录》成宗卷二八五),甚至李朝正祖、纯祖

年间曾下令禁止中国小说,但是并没有阻止中国小说的大量输入。

90年代初,韩国影印出版了收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的《中国历史绘模本》。这是一本古代朝鲜人所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插图的摹写汇集,卷首序言由完山李氏在朝鲜李朝英祖三十八年(1762)所写,列举了当时在朝鲜半岛流行的中国古代小说七十余种,其中不仅有中国古代小说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剪灯新话》、《西游记》、《金瓶梅》、《醒世恒言》、《拍案惊奇》等,也有大量的二三流小说和《肉蒲团》、《杏花天》等色情小说。以后,《聊斋志异》、《红楼梦》等清代小说传入朝鲜半岛的情况,也可以找到有关记载。除此之外,现韩国保存的古代书籍中还记载了许多其他中国古代小说的书名,有些我们在中国国内和韩国都已无法找到原书,可见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流入朝鲜半岛的中国小说数量之巨大和种类之繁多。

大量中国古代小说传入朝鲜半岛以后,极大地影响和促进了朝鲜半岛叙事文学的发展。本来,朝鲜民族就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古代兴起于朝鲜半岛的高句丽部落、沃沮部落以及半岛南端的三韩(马韩、弁韩、辰韩)部落,以及后来建立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都有着自己的神话和传说,只是没有文字记载罢了。汉字通行于半岛以后,这些神话和传说才被记入高丽僧人一然(1206—1289)编写的《三国遗事》等书中。而早于此的新罗时期,实际上就有人创作了类似唐人传奇的叙事作品,如《新罗殊异传》中的《仙女红袋》,与唐人小说的风貌十分近似,甚至可以放在唐人小说中无法分辨。这种特异和超前的文学现象发生,正是新罗作家直接受到唐代文学濡染的结果^④。

大约在12世纪的高丽时期,收有大量传奇小说的《太平广记》传入朝鲜半岛,从当时著名文人林椿、李奎报、李齐贤等人的

传记、野史作品中都能看到其影响。李朝世祖八年(1462),成仁编辑刊行了《太平广记》的节缩本《太平广记详节》五十卷,加上从其他朝鲜书籍中收录的篇什而成的三十卷,成为八十卷的《太平通载》,之后出现了多种《太平广记谚解》一类书籍。产生于高丽时期,至李朝仍十分兴盛的“稗说体”(包括杂记、漫录、琐话、解颐、闲话)文学显然深受《世说新语》、《酉阳杂俎》、《太平广记》等书的影响,为古代朝鲜 15 世纪小说的出现作了准备。

中国明代初年瞿佑所作《剪灯新话》大约在 15 世纪时已经传入了朝鲜半岛。因为 15 世纪后期,金时习(1435—1493)已经模仿《剪灯新话》,用汉文创作了短篇小说集《金鰲新话》^⑤。《金鰲新话》被称为古代朝鲜文学史上第一部符合近代小说美学要求的短篇小说集。虽然其在形式体制和语言风格、表现手法上模仿《剪灯新话》,但其以古代朝鲜的历史事件、现实生活为题材,以古代朝鲜的自然风光、民俗民情为背景,表达了作者自己的理想信念,自己的欢乐和悲哀,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格,为 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上半叶短篇汉文小说,如《企斋记异》、《元生梦游录》、《皮生冥梦录》、《挹川梦游录》、《云英传》、《崔陟传》、《周生传》等提供了典范。

16 世纪末、17 世纪初中国的一些长篇白话小说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陆续传入朝鲜半岛,这对古代朝鲜长篇小说的产生和发展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至 17 世纪后半叶,李朝肃宗时出现了金万重(1637—1692)的《九云梦》和《谢氏南征记》,从而开创了古代朝鲜长篇小说的纪元。《九云梦》是一部十六章回的小说,以梦幻的形式,叙写书生杨少游的宦途经历及其与八个女子的奇异故事。《谢氏南征记》以男主角刘延寿为中心,描写其妻妾矛盾争斗,结构复杂,人物众多。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小说皆以中国为背景:《九云梦》主角杨少游为唐时淮南